



抗战时期大后方 社会变迁研究 (上)

尚季芳 党庆兰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北抗战大后方文献资料整理研究”
(项目编号: 16AZD037) 资助出版

抗战时期大后方 社会变迁研究 (上)

尚季芳 党庆兰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变迁研究：全2册 / 尚季芳，
党庆兰主编. —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9.1
ISBN 978-7-311-05513-4

I. ①抗… II. ①尚… ②党… III. ①社会变迁—中
国—近代—文集 IV. ①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302589号

策划编辑 梁建萍
责任编辑 马继萌
封面设计 郇海

书 名 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变迁研究(上)
作 者 尚季芳 党庆兰 主编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press.lzu.edu.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甘肃春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464千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5513-4
定 价 98.00元(上、下)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开拓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第二届高端论坛暨大后方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

(代序)

2017年9月15—17日，由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办，《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历史教学》编辑部、《历史档案》编辑部、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第二届高端论坛暨大后方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兰州隆重召开。来自国内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学术论文97篇。学者们围绕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与文化、民族与边疆，以及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地位等主题展开深刻讨论，取得丰硕成果。

一、抗战大后方的政治

对抗战大后方政治的研究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主要有西北师范大学尚季芳的《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四个自信——兼论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历史逻辑》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理论建构、自身制度建设、抗战道路设计、抗战文化创新等方面的先进性切入，详细阐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兰州大学刘继华、吴楠楠的《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兰州的学运工作》论述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兰州推动国民党开展学运、民运工作，同时争取将其合法化，以凝聚抗战力量。

此外，重庆档案馆唐润明对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历程进行了综合考量。

二、抗战大后方的经济

抗战大后方的经济研究成为会议关注的热点，论文颇多，主要集中探讨了大后方的经济生产、经济政策、交通运输等。

经济生产。西北师范大学王勇、文娜的《黄土高原、军民生产与“最优合

约”——从“井田之谜”切入》认为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实现了外部威胁条件下的生产能力与防御能力的最优均衡，军民合作达到宪制意义上的“最优合约”。酒泉社会科学院孙占鳌的《抗战时期的玉门油矿开发》指出抗战时期玉门油矿开发，取得显著成效，不仅支援抗战，而且对西北地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程得中的《西南抗战大后方的水利开发和建设》从农田水利、饮水、水力发电、河道整治等方面对抗战时期重庆的水利建设做了探讨。

此外，嘉兴学院曾静分析了工合运动在宋美龄的宣传和帮助下兴起与发展的历程。华中师范大学邵彦涛考察了兰州手工毛纺业和机器毛纺业各自兴衰的历史及其在抗战时期交织叠合的发展样态。西北师范大学王一婷梳理了抗战时期甘肃电力工业的发展概况。西北师范大学耿东旭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家庭纺织业进行了探析。

经济政策。南京师范大学齐春风的《抗战时期大后方对日经济绝交政策的实行与调整》指出随着抗战大后方经济形势的恶化，国民政府认识到与日伪及沦陷区经济绝交的政策需要调整，但早期探索松动经济绝交政策的活动是秘密进行，且这种变动带来双重影响。四川文理学院陈岗的《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猪鬃的贸易统制》认为国民政府战时的猪鬃统制政策，发挥了猪鬃经济抗战的作用，但也剥夺了从业者自由贸易的权利。宝鸡文理学院郝银侠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运输制度之研究》指出国民政府设置粮食运输机构和制度以解决粮食运输问题，虽效果并不显著，但运输制度基本完成自身使命。

此外，西南民族大学卢征良从资本属性角度对抗战时期省营企业公司进行探析。西南科技大学叶宁对1940年成都市粮食囤积投机的特点和国民政府的处理方法进行深入分析。陕西师范大学李佳佳的《因运而生：抗战时期西北驿运再研究》探讨西北驿运开展的动因、制度设计及其具体运作机制，考量其存在的困境和为抗战发挥的积极作用。

三、抗战大后方的军事

对抗战大后方军事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大轰炸的具体事实和轰炸记忆方面。《兰州晨报》王文元的《兰州空战》论述了抗战时期日军对兰州的空袭，以及中国军民的英勇反击。长安大学杨博的《日军空袭下的西安旅行及“家国”想象》对日军空袭下的西安行旅生活进行考察，探析这种轰炸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与变化。西北师范大学李江龙、胡君英通过口述史料对平凉人民的反轰炸斗争进行探讨。西北师范大学岳丽、王梦洁对抗战时期日军轰炸西北地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

此外，学者对沦陷区的军事也有所探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高晓燕对东北沦陷

区731细菌部队和516化学部队进行了探究。

四、抗战大后方的社会

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研究，颇受学者们关注。本次会议主要从思想观念、社会建设、社会问题和社会变迁等方面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思想观念。西南大学张武军、杜蕊蕊的《延安文人婚恋和创作心态探究——大文学视野下的萧军日记考察》以大文学视野剖析了抗战时期萧军在延安独特空间背景下的婚姻家庭生活及其创作心态。

社会问题。甘肃社会科学院谢羽的《积极的慈善救助——抗战时期甘肃的工合运动》概述了抗战时期甘肃工合社在发展小手工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慈善活动。重庆大学杜俊华的《论陪都时期重庆城市近代化中的企民矛盾——以北碚富源电力公司为例》通过梳理北碚富源电力公司在建设过程中与部分民众利益的冲突及解决，初步考察了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企民矛盾。

社会建设。西南大学谢长法、陈磊的《抗战时期重庆职业指导所述论》概述了重庆职业指导所积极开展职业介绍、难民就业指导和升学就业指导等工作及其在维系后方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贵州理工学院敖以深的《抗战视域中“田园城市”理论传播与贵阳市政建设》探讨了在“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下，抗战时期贵阳城市从传统封闭向现代开放转型演变的问题。重庆师范大学罗玲的《筚路蓝缕之功：高显鉴乡建运动研究》从兴办各类乡村教育机构、改革四川社会风俗、创办乡建刊物等方面论述了高氏的乡建事业。三峡博物馆黄河对战时重庆城市的街道卫生整治问题进行了关注。重庆档案馆胡懿对抗战时期重庆的消防设施进行了探讨。

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唐凌的《透视桂柳会战期间中国社会的一扇新窗口——〈吴公治日记〉介评》利用吴的日记，从沿途疏散的境况、当时社会的各种关系、个人及家庭的情感生活三方面，展示桂柳会战期间大后方社会转移的悲壮历史画卷。阜阳师范学院梁家贵的《民间组织与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变迁——以秘密社会为中心之探讨》认为抗战时期西北的秘密社会在自身利益诉求、政治参与和价值取向上出现前所未有的分化和组合，从而加剧西北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变迁。陕西师范大学武端利探讨了西安事变对陕西社会经济的影响等问题。

五、抗战大后方的思想与文化

抗战大后方的思想与文化，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随着抗战全面爆发，中国社会经历着剧烈变动，给民众心理造成巨大压力，同时大批文教机构和知识分子被迫西迁，造就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抗战特色。

文化团体。贵州理工学院胡友平的《浅析抗战时期促进浙江大学内迁遵义湄潭的动因》探讨了战时浙江大学内迁湄潭的内因、外因。河南大学侯培和系统考察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的艰辛历程及国人对保存民族精华的责任担当。河北大学何辉的《抗战大后方的文化——雷石榆在西南地区抗战文学创作活动及评介》论述了抗战时期雷石榆在昆明积极从事文艺活动和创作，对西南地区抗战文艺的发展产生广泛影响。乐山师范学院何刚的《明耻教战——抗战时期翦伯赞先生的明史研究》认为抗战时期翦伯赞的明史研究不仅总结明史演进规律，且具有揭露日本侵略、强调团结抗日等明显的现实指向。重庆社会科学院吕昕的《黎东方与大后方通俗讲史的兴起》指出这种通俗讲史活动，不仅普及了历史文化知识，而且增强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兰州大学储竞争指出在抗战背景下，左公柳所具有的历史及象征意义，使其成为抗战宣传的最好素材。

六、抗战大后方的民族与边疆问题

对抗战大后民族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是本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华各民族共赴国难，体现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民族精神。新疆社会科学院贾秀慧的《抗战视阈下的新疆汉族商帮》认为，在抗战时期新疆各族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得到深化，汉族商帮与各族商民团结一致，领导并参与抗日救国活动。四川民族学院周正龙的《抗战大后方民族上层支援抗战研究——以西康省为例》分析了西康省民族上层人士利用富有地域、民族特点的方式积极支援抗战。

七、抗战时期的国际交往

抗战时期的国际交往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并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人民的艰苦斗争以及付出的巨大牺牲，中国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国际交往和扩大国际宣传。

文化科技交流。西南大学周勇、刘婧雨的《美国主流社会眼中的中国大后方抗战电影纪录片〈苦干〉——尝试从影像史学视角的考察》从影像史学的角度，第一次重建《苦干》在美国上映盛况，分析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及抗日战争的新认识，推动美国对中日战争的立场转变。三峡博物馆艾智科的《救存、援助与获取：战时中美图书资料交流研究（1940—1945）》指出由于中美双方国际地位的差异，在图书资料交流中发挥的作用不均衡。重庆社会科学院胡攀的《略论抗战时期中外科技交流及其对重庆的影响》论述了抗战时期在重庆的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通过多种方

式积极进行中外科技交流的概况及其影响。西南大学蒋娜以《中苏文化》杂志为例，认为抗战时期中苏间进行的文化交流对中苏外交产生极大促进作用。

战时外交。厦门大学王明前的《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与军事工作指导评析》考察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与军事工作的指导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其不认真研究中国国情，对中国同志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认识不够。华中师范大学冯国林以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员日记为中心，对韩国独立运动进行了研究。

八、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地位

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地位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西北大学路中康、陶亮、刘燕花、龚琦探讨了西安抗战遗址的保护现状、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为其开发利用提供了建议。

此外，南京大学李玉的《美国驻华领事馆文献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刍议——以前期抗战为中心》详细介绍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驻华领事馆文献中，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文献资料，认为这些史料不仅会对学术研究产生多方面的助力，而且有利于深刻认识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杜继东指出，西北抗战大后方不仅为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要充分认识西北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性，地方政府要加大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资助，要把西北师范大学建成西北抗战大后方的资料中心、研究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南开大学江沛指出，抗战时期西北为苏联援华的重要通道，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地，要整合一切优势资源，加快西北抗战研究的进度和加大西北抗战研究的力度，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服务。西南大学周勇表示，我们要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同时要关注西北抗战大后方的研究，西北师范大学要高高举起西北抗战史研究的旗帜，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坚持不懈，不断取得成功。南京大学李玉认为，西南既是抗战的前线，亦是抗战的后方，而西北才是真正的后方中的后方。西北的治乱兴衰关乎着国家的安全，抗战时期正是西北的稳定和疆土安全，才保证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九、特点与不足

会议期间，专家们积极进行学术切磋，介绍新成果、新资料、新理论、新方法，对抗战大后方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议题予以探讨，提出一些富有创见性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会议取得丰硕成果。一是引用史料的丰富多样化。档案、报刊、口

述史、日记、影像等一手资料，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和国外资料都得到关注，尤其是国外史料的运用有利于促进“中国抗战”的国际化和“国际抗战”的中国化。二是论文选题涵盖面广，且具有足够的研究深度。三是参会学者来源广泛，且吸引了众多高素质的青年学者云集，不仅显示抗战大后方研究的魅力，而且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储备了人才。四是学术研究继续创新，力争瞄准学术前沿问题，提出要关注大后方民众的心态研究以及从影像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研究大后方等。五是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研究法，多维度立体解读史实。

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选题区域不平衡，多集中在西南抗战大后方，对西北抗战大后方关注较少。二是缺乏从域外视角构建知识体系，多是从内部视角来解读。三是选题上虽重视社会史研究，但对社会底层民众关注不够。四是关注现实不够。学术研究与现实的关联度需要加强，研究成果服务现实的意义没有充分体现。五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不足，尤其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成果的继承和贯通不够。六是对抗战遗址的相关研究不够，需要挖掘其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价值。

学者们一致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要不断加强学术理论修养，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贴近现实加强人文关怀，以及转换视角进行跨学科研究等。尤其需要加强规划和整合力量，深入开展西北抗战大后方研究。相信经过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将会开拓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新局面。

目 录

(上)

政 治

- 003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四个自信
——兼论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历史逻辑 尚季芳
- 015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兰州的学运工作 刘继华 吴楠楠
- 032 抗战大后方陕甘宁边区军政建设研究 雷兴鹤
- 041 试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原因 唐润明

经济政策

- 061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猪鬃的贸易统制 陈 岗
- 073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运输制度之研究 郝银侠
- 084 国营企业,还是省营企业?
——抗战时期省营企业公司概念问题探析 卢征良
- 092 抗战时期大后方对日经济绝交政策的实行与调整 齐春风
- 104 “囤积居奇”与“日食之需”
——1940年成都市社会危机治理中的粮食投机问题 叶 宁
- 118 “我总算尽了最大的努力报答国家”
——记朱镜宙在抗战大后方征税筹资 朱有发

经济生产

- 127 宋美龄与战时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曾 静
- 145 西南抗战大后方的水利开发和建设 程得中
- 152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家庭纺织业探析 耿东旭
- 162 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交织:近代兰州毛纺织业的发展 邵彦涛
- 172 抗战时期的玉门油矿开发 孙占鳌
- 185 战时甘肃电力工业的发展概况
——以兰州电厂为例 王一婷
- 193 黄土高原、军民生产与“最优合约”
——从“井田之谜”切入 王 勇 文 娜
- 207 抗战时期金城银行的内迁 陈礼茂
- 221 因运而生:抗战时期西北驿运再研究 李佳佳

军 事

- 249 论侵华日军的两支生化战部队
——731 细菌部队与 516 部队的关系 高晓燕
- 256 论抗战时期日军轰炸平凉与平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 李江龙 胡君英
- 265 兰州空战 王文元
- 268 日军空袭下的西安旅行及“家国”想象 杨 博
- 282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轰炸西北地区研究综述 岳 丽 王梦洁

社会变迁

- 295 民间组织与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变迁
——以秘密社会为中心之探讨 梁家贵
- 306 透视桂柳会战期间中国社会的一扇新窗口
——《吴公治日记》介评 唐 凌
- 318 西安事变前后的陕西政局与社会
——以陕西邮政管理局档案为中心的探讨 武端利

政

治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四个自信^①

——兼论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历史逻辑

尚季芳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日本侵华,举国震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抵制日寇,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成为中国人民最大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勇敢地承担起一个先进政党的历史责任,在抗日理论建构、自身制度建设、抗战道路设计、抗战文化创新等方面,都体现出超凡的自信和卓越的领导力,斯时的其他政党无出其右者,使她成为当之无愧的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急先锋。至今体味斯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仍有极其丰富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中流砥柱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关乎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抗战理论以及国家建设理论,使得中国的抗战有章可循、有理可依,不再是盲目的无序的,使得中国人民清楚为谁而抗战,为什么要抗战,怎么去抗战,抗战的最终胜利属于中国等重大问题。因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使她当之无愧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抗日战争的政治导师、精神领袖,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国家道路的设计者。

一、理论自信:论持久战、全民抗战及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坚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早在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②1935年8月

*作者简介:尚季芳(1976—),男,汉族,甘肃张家川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①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北抗战大后方文献资料整理研究”(16AZD037)和2015年西北师范大学重大培育项目“西北抗战大后方文献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SKZD15003)阶段性成果。

② 郑惠等:《中国共产党通志》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八一宣言》，呼吁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并不断因应形势的变化调整政策，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由此开启。

在抗战的具体进程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持久战的战略理论，为中国抗战指明了方向。当亡国论和速胜论混淆视听之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应时而生，不仅批驳了上述论调，而且回答了中国的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为什么中国最终会胜利，怎样争取最终胜利这些事关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他根据敌强我弱、战争的变动性等客观事实提出了持久战的三阶段说，即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期。^①毛泽东的这一抗战公式以其高超的智慧和理论勇气，成为指导抗战走向的不二法门，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强的理论自信。

在抗战社会动员上，中国共产党依然体现出史无前例的和超越同时代的理论高度和自信，即只有最大限度地调动蕴藏在最底层的民气，才能将日寇赶出中国。毛泽东多次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②，“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③动员民众“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④。“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⑤中国共产党就是“要率领无数千万的革命群众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⑥。历史事实证明，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是弱国打败入侵强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路线，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实践，中国共产党选出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并且

① 《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2页。

② 《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③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④ 《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⑤ 《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⑥ 《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形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中国化的^①伟大理论——毛泽东理论，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锐利的武器。刘少奇说：“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们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②“这个理论，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③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最终形成的毛泽东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当时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伟大思想贡献，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制度自信：“三三制”、军建及党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在于她的制度建设能够适合时代的要求，甚至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引领着中国之命运。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形式上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即“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④“三三制”原则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吸收更多的抗日力量，集聚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资源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队的制度建设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又一重要制胜法宝。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⑤故军队建设必须制度化、规范化。第一，军队的政治工作要高度重视，它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为此才能“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⑥第二，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服从于党的领导。第三，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四，对待敌军，

① 《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② 《论党》，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③ 《论党》，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④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⑤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2页。

⑥ 军事科学院《谭政军事文选》编辑组编：《谭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要坚持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第五，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①军队建设的制度化使得八路军在军风、军纪、军民、军政、官兵、战斗力等方面都与军阀的部队截然不同，他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他（她）们的唯一的宗旨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②，是真正的人民的子弟兵。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同时期各政党的制度建设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与中共的党建相提并论，这也是为什么中共能够时刻把握时代命运，发出时代最强音，引领中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缘故。毛泽东把党建看作是一项“伟大工程”^③，看作是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因为这个政党的伟大目标是“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而要完成这样艰巨光荣的任务，“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④那么，要怎样建设党呢？对此党的领导人都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要深入学习马列理论，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学生，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理论、观点和立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⑤同时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发展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⑥共产党员应该始终将国家利益、人民的福祉作为至上目标，“在政府工作中，应该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⑦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必须要参加革命的实践，“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2-983页。

② 《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③ 《〈共产党人〉发刊词》，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④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⑤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

⑥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⑦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